严肃党的纪律 维护中央权威

——读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文章号召共产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对于纠正党员思想上的不正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 王 涛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一贯重视发现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提出要从思想上肃清，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促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抗战初期毛泽东撰写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出发，反对无原则的和平、反对腐朽庸俗作风的重要著作，今天读来仍有重要启示。

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从1937年4月起，毛泽东每星期二、四上午到抗大讲授唯物辩证法，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历时三个多月。抗大学员中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很多，有人对当时中央领导层开展的对张国焘的批判不满，对于怎样看待张国焘，怎样看待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有种种说法。也有学员在发言中指出要摆脱错误的领导，团结在新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一心搞好学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学员们的发言反映出党内存在着复杂的思想倾向，若不及时引导和纠正，势必弱化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组织。

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于1937年9月7日写成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有利于战斗的武器。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活，毛泽东以十分精炼的文字历数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主要有：对错误言行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命令不服从，不要组织纪律；搞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对待群众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听之任之；对待工作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等。

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在党内生长泛滥，会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毛泽东对党内自由主义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他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群众利益为重、以党的团结为重，坚决把自由主义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

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

自由主义在党内是一种痼疾，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全面抗战的复杂环境中，党要成功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重大困难、重大考验、重大风险，必须克服自由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做到令行禁止，向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看齐。毛泽东不仅指出党内自由主义的危害，而且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权欲熏心，对党中央北上的决策漠然视之，后来另立“中央”，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无视党中央权威，经常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这种自行其是、自由主义的行为，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搞“百家争鸣”，各人有各人的说法，那么党中央就没有权威，党的领导就没有力量，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革命胜利将遥遥无期。

因此，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坚持正确的原则，勇敢地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共产党员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努力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党组织要时刻警戒自由主义，这样去做危险就可能减少。这些论述，对当前我们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仍有指导意义。

反对自由主义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

自由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必须抓住主观主义这个要害，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而且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如此才能实现彻底的思想转变。

反对自由主义首先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那么掌握再多的马列主义“本本”也没有用，只能是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表面功夫，最终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害了革命。只有打倒主观主义这个大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发挥力量，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克服自由主义的关键。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每一个党员对党的纪律都要心存敬畏，并严格遵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对于涉及全党全国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向全党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而且明确提出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斗争的任务。

1942年4月，中央宣传部将《反对自由主义》列为延安整风22个必读文件之一，成为全党改造思想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把22个文件看作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20年经验的总结。他要求大家对这22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并且对照文件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延安整风运动基本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读经典

（上接1版）1938年10月，鉴于长征途中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错误行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和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着眼于中国革命的胜利，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1945年，党的七大首次把党的纪律写进党章总纲，同时将“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载入党章。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延安整风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鲜明提出“两个务必”，从解放战争中的整党整军到新中国成立初开展整党整风以及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等，党和毛泽东都是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首部全国执政条件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内根本法规，但“左”的错误的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对执政党建设的严重破坏，从反面证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于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一党内重要法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进一步形成新时期“从严治党”基本制度，其中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中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983年，为领导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各项工作，全党开始整党。1985年党中央在《关于农村整党的工作部署》中，首次使用“从严治党”。1987年十三大则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从十四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特别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上升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为实施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活动，取得成效。

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不仅在“从严”上着力，而且明确要“全面”从严，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贯穿党中央工作的一条鲜明主线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举措，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党内法规50多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责任追究为导向的“制度群”，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与此同时，出台中央八项规定，领导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愈益显现，党内政治生态、党员干部精神面貌、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突出亮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制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主题。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的整体设计，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渐次展开和深度推进。两个文件的制定和修订，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鲜明地反映了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着眼现实与谋划未来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充分反映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和一贯要求。

从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将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到新高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实践中。伴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初创之时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执政大党，并形成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实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实践上开创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发挥从严治党这一制胜法宝的作用，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这次全会所通过的《准则》中提出的“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是已经被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既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创立之初，党就逐步认识到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中，批评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强调“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此后，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作为重要任务，并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十一届五中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训，在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正式采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党的十二大党章及此后党章的总纲中，都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要求。这些重要规定和要求，为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总规矩。从一定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全面贯彻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章。党章所蕴涵的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含盖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组织要求、作风要求、纪律要求和生活要求。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就必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会提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四个着力”的总要求，明确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方向，决定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方法，展现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态前景，应该成为全党的自觉追求。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全会强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以实际行动来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守护者和践行者。只有坚持“四个自信”，才能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来自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而必须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护旗。同时，要坚持把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挥从严治党这一制胜法宝的作用，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既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历史经验证明，思想建党的每一步都需要制度的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从历史上看，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中国共产党就处于险境。遵义会议前14年的革命历程中，囿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党不能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损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党和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和红军就能焕发生机，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次会议及随后的几次会议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了党和红军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此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了全党全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各民族的统一，甚至是各种力量的统一，从而形成了革命的大团结。

改革开放之初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被誉之为党的历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解放思想，发扬民主，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正确的组织路线和组织原则，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制度为党和国家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可靠保障。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汲取党的历史上制度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强调从严治党就要遵守党章党规和国家宪法法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首先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等。这次全会，又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要求，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突出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这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重中之重。

历史的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有正确的科学理论、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要有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严密的组织纪律。党创立至今所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制度规定，对于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形成有集中有民主、有纪律有自由的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全体党员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落实在行。只要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只要各级党组织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发挥从严治党政治优势，扎紧从严治党“制度之笼”，真正把“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落到实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全力培育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重要的政治保证。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用典释义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讲话原文】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安不忘危，才是生存发展之道。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出处】

李密问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子曰：“必也义乎？”

——（隋）王通《中说·周公篇》

【解读】

王通（584—617年），隋代大儒，死后门人私谥曰文中子。他认为儒释道三教可以相互沟通，但重点弘扬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其后人模仿《论语》，撰《中说》（亦名《文中子》），以王通与门人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

在《中说·周公篇》中，记载了李密与文中子王通的一段对话。李密问何谓英雄？文中子答道：“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意思是能够正确估价自己，并且克服各种私心杂念、战胜自己的人，才是英雄。

《中说》一书对道家言辞援引颇多，并模仿行文。“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显然脱胎自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关于英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定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英雄。但“自知”与“自胜”无疑是历代英雄的共同品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就是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以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杨立新）